

# 陸若漢其人其事

戚印平\*

在以往中國學者有關天主教東傳史的研究中，陸若漢很少被人提及。按照傳統的評判標準，他在教會中的地位、其歷史影響力以及在學術研究中的知名度，都遠不及“傳教聖人”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以及首任中國教區會長利瑪竇（Matteo Ricci）。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變換一下視角，關注普通耶穌會士的命運以及教會生活中不為外人所知的種種隱秘，陸若漢就完全有資格成為最合適的研究人選之一。其孤兒院的貧寒出身，在日本教會學校接受系統訓練，並長期擔任教會“通辭”和負責經濟事務的“管區代表”等職務的經歷，使他成為遠東耶穌會史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修道士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陸若漢奇特的一生，概括或揭示了遠東耶穌會史的眾多特色，他應當成為我們考察這段歷史的十分恰當的切入點。

## 早期生涯與學業背景

陸若漢原名若阿·羅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為了與其他同名同姓者加以區別，當時教會內部因其一度負責教會外交事務而稱之為“通辭羅德里格斯”<sup>(1)</sup>。與許多出身於豪門世家的貴族傳教士不同，我們對他的身世瞭解很少，據某些教會文獻中的簡單記錄推測<sup>(2)</sup>，他出生於1561年，是葡萄牙中部高地貝拉山區塞爾娜塞利的農家子弟。因父母早亡，這位在孤兒院中長大的孤兒，在十三、四歲時被教會送往遙遠的東方。

據教會學者庫珀（Michael Cooper）的考證，陸若漢是與耶穌會遠東地區巡視員范禮安及其攜帶的四十一名耶穌會士一起，乘坐由五艘帆船組成的艦隊，於1574年3月21日從里斯本出發，並在當年的9月6日到達果阿。<sup>(3)</sup>兩年後，年僅十六歲的陸若漢在經歷了又一次長途旅行之後，於1577年7月4日抵達日本九州の平戸，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日本傳教生涯。

陸若漢抵達日本時正逢日本教會史上極為重要的發展時期。自沙勿略神父1549年8月登陸日本

後，耶穌會士不僅在九州地區建立起較鞏固的基地，而且成功地進入京都，與剛建立霸權的織田信長建立起良好關係。1577年8月15日，時任京都教區布教長的奧爾格蒂諾（Gnecchi Sokdo Organtino）神父在那裡修建了被稱為“京都南蠻寺”的著名教堂。

由於從未接受過任何訓練與學習，在抵達日本之後的最初時期，年幼的陸若漢祇是作為神父的隨從，從事一些低級的教務協作工作。1580年11月，年僅十八歲的陸若漢和六位年齡相仿的葡萄牙少年以及六名日本人，被送入剛剛在臼杵建成的修練院，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大約經過一年的初級訓練，陸若漢又和另外五名葡萄牙人一起進入設立於府內的聖保祿神學院，接受更高层次的學習。<sup>(4)</sup>

根據考證，陸若漢在神學院首先進入以語言學習為主的人文課程（Humanioa），1583年10月，又昇上以經院哲學以及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所謂哲學課程（Artes, Philosophia）<sup>(5)</sup>，大約在1585年，才開始學習神學課程（Theologia）<sup>(6)</sup>。經過一系列系統的學習，陸若漢由一個近乎文盲的農家之子，成長為擁有各種知識和技能的合格傳教士。

\*戚印平，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浙江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哲學系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宗教學會理事。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12屆（2004-2005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提交的課題研究論文之一。

關於上述課程教授的實際情況，教會文獻的記述語焉不詳，但可以想象的是，它應當與其樣板即當時歐洲教會學校的教學模式差別不大。<sup>(7)</sup>或許是考慮到日本的實際情況與傳教需要，范禮安對傳統的教學模式作了某些調整。他在1582年1月的一次會議上，要求強化人文課程中的語言學習與文化知識。他說：“我的意見是，目前那裡祇開設語法和人文課程。此外，還應學習幾種（日本）文字及其書寫方式，並學習日本修士必須掌握的其它知識。另一個神學院應盡可能早地開設於京都，那裡應該學習哲學和其它的高級學問。（……）在豐後學完人文課程的人應該被送到那裡去。”又說：“所有的神學校都應該設置統一的文法課程。年長的學生和年輕的學生不應混合就讀，如果有適當的設備，年長的學生應該進入設在府內的神學院。同時，最好有另外一所神學校，教授學生們必須掌握的人文課程和有關日本文化的知識。”<sup>(8)</sup>

或許是由於范禮安的要求，學習日本語言成為府內神學院人文課程的重要特色。在神學院中，日本語的學習列為正規課程，而且是語言學習的重點之一。關於這方面的情況，科埃里（Gaspar Coelho）神父曾在《1581年度年報》中頗為興奮地提到剛完成的語法工具書和某些譯為日本語的護教書籍：“日本語文法書在本年完成了，此外還有辭典和日本語著述數種。聖教要理也已譯成日本語。這樣，我們可以使日本修士對於我們的聖教更為瞭解。此外，使用這些書籍亦有助於我們教育那些試圖新改宗的人皈依。”<sup>(9)</sup>為了使這種語言學習更有成效，教會還特別配備了日語教師。府內神學院教授日本語的教師是日本修士養方軒保祿。這位年過七十的老者，精通漢學和古典文學，擁有多方面的知識，被公認為神學院最理想的日語教師，就連對日本人極為鄙視的卡布拉爾神父，也認為保祿的學識和品德無可挑剔。<sup>(10)</sup>

由於缺乏具體史料，我們還不清楚陸若漢如何接受語言培訓，但從他此後的發展情況看，他的語言學習極富成效，而他對日本語言的精確掌握與熟練運用，則成為他此後名聲大噪的首要條件。

## “通辭”的外交使命

對於年輕的陸若漢來說，1591年3月3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重要時刻。那一天清晨，他以范禮安神父“私人翻譯”的身份，隨二十六人的龐大使團列隊前往京都的著名別墅聚樂第，謁見在四年前發佈〈傳教士驅逐令〉並自稱“天下第一人”的獨裁者豐臣秀吉。

或許是由於初出茅廬的陸若漢資歷尚淺，在記錄此事的1592年10月1日的《日本年報》中，作者弗洛伊斯（Luís Fróis）很少提到他，祇是聲稱陸若漢受到豐臣秀吉特別賜予的禮物三十枚銀子和一件絲質日本服裝。在參觀完聚樂第莊園後，豐臣秀吉又將陸若漢喚來，與他交談至深夜。第二天，豐臣秀吉再次將他招去調校范禮安送給他的鐘錶。其間，豐臣秀吉向陸若漢提出了無數問題，他不僅向這位異國青年再次透露了遠征中國的遠大目標，甚至還婉轉解釋了四年前發佈傳教士驅逐令的原因。<sup>(11)</sup>

弗洛伊斯沒有描述陸若漢如何應對豐臣秀吉的詢問或解釋，但明確地記道：“關白殿（豐臣秀吉）從我們的修道士陸若漢那裡獲得了巧妙的回答。”他認為，陸若漢的回答、范禮安的禮物以及日本基督教大名的遊說，是導致豐臣秀吉態度緩和的重要原因。<sup>(12)</sup>他還告訴我們，當范禮安一行離開京都時，已獲豐臣秀吉信任的陸若漢被要求單獨留在京都。直到該年底，他才拿着豐臣秀吉的回信和他送給印度總督的禮物前往長崎，與范禮安等人會合。

關於陸若漢在其間的活動，我們還找不到詳盡的史料記載，但弗洛伊斯聲稱，被豐臣秀吉指名留在京都的陸若漢曾經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外交危機。他告訴我們，在準備回贈給印度總督的禮品時，曾在織田信長身邊見過范禮安的豐臣秀吉突然對他的特使身份產生疑慮，懷疑神父在假公濟私、冒名頂替，於是派人去詢問陸若漢。陸若漢對來者解釋說：“本次使節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因為這是公開的事，無法偽裝。使節帶着眾多隨員從印度出發，經過許多異教國才來到這裡。他們還在中國澳

門停留了很長時間，帶來了馬和其它許多惟獨印度才有的物品，偷偷來此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沒有贈送那些物品，不可能用其它方法獲得它們。”陸若漢還聲稱：“使節公開在長崎登陸，與日本四公子（天正少年使團）一起歸來。港口中還有別的定期航船入港，所以能向許多葡萄牙人確認其真實性。如此冠冕堂皇的公開使節決不可能是偽裝的。瞭解所有情況的總督，一定會對此欺名盜世之舉極為憤怒。”豐臣秀吉又問：“我已決定將所有的傳教士從本國驅逐出去，為何還有神父來此執行如此使命？”對此，陸若漢的回答坦率而又留有餘地，他說：“范禮安曾在信長時期來過日本，後來返回印度，但知道殿下成為日本的君主後厚待並保護神父，所以才派遣使節來到日本。由於范禮安有來過日本的經驗，所以總督將此使命交給了他。他在從印度出發時並不知道殿下已驅逐傳教士。”由於缺乏比對材料，我們很難確定弗洛伊斯的一面之辭在多大程度上與事實相符，但無論如何，陸若漢隨機應變富有辯才的天賦由此可見一斑。<sup>(13)</sup>

1592年5月，豐臣秀吉率軍到九州名護屋，為入侵朝鮮做準備。在得到軍中信徒的通風報信後，陸若漢在6月再次以教會代表的身份，與來到日本的葡萄牙船長佩雷拉一起前往致意，與他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交談。由於相關記錄過於簡單，不清楚陸若漢再次與豐臣秀吉相見的具體細節，但這個喜怒無常的獨裁者似乎對年輕的陸若漢頗有好感。當陸若漢在一個月後因病返回時，他甚至頗為不悅地問道：“為甚麼他不能留在當地治療呢？”<sup>(14)</sup>

我們不清楚陸若漢何以迅速取得豐臣秀吉的信任，很顯然，這種特殊關係的建立不完全是由於陸若漢的語言才能，他一定還擁有某種外交天賦。出於這兩種過人之處以及范禮安的信任，陸若漢很快從一大批同輩人中脫穎而出，開始以“通辭”的身份，承擔起教會與當局聯絡溝通的重要使命。

須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特定情境中，“通辭”一職的工作性質與內容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除了一般性的語言翻譯，“通辭”至少兼有教會新聞發言人、教會事務代理或者外交使節等多種使命。

他們負責與當局溝通聯絡、調解或處理日常事宜和各種突發事件，還須勝任外交密使及貿易談判代表等眾多角色。因此當時日本教會的“通辭”不僅要精通語言，而且要瞭解當地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俗，並具有與其職能相適應的公關才能與溝通能力。與前輩弗洛伊斯時期相比，陸若漢出任此職時的政治形勢更為嚴峻而複雜。隨着豐臣秀吉完成日本統一，原來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以往屢試不爽的縱橫之術已無用武之地，在持久的禁教壓力下，能否搞好與最高統治者的關係，獲得他們的好感，不僅成為“通辭”是否稱職的唯一標誌，而且關繫到整個教會的生存。

1596年的3月，陸若漢為晉陞神職，離開日本前往澳門，但他很快於當年的8月，陪同第一位日本主教馬爾蒂斯（Dom Pedro Martins）重返日本<sup>(15)</sup>，隨即前往京都，為主教拜訪豐臣秀吉做先期準備。在他的斡旋下，豐臣秀吉在11月17日會見了主教神父。他雖然沒有撤銷名存實亡的傳教士驅逐令，卻破天荒地允許主教公開長駐日本。關於這次極為成功的外交成就，陸若漢自己在多年後仍記憶猶新。他頗為自許地記述道：“主教派遣耶穌會神父陸若漢於長崎港前往太閤居住的伏見（Fuximi）宮廷，為當時有關基督教諸事與太閤交涉。他每年都負責代表日本教會的上長與神父拜訪的任務，並被任命為總督梅內塞斯遣往太閤處的使節。1591年曾讓他接洽四位日本公子及范禮安與太閤的會面。因此，他與太閤很熟。該神父代表主教與太閤接洽，告訴他主教帶來的總督的書信與禮物，想獲得太閤的允許與他見面。太閤對此很高興，命令主教立即來宮廷與他會面。由於同時長崎奉行、唐津國領主的寺澤志摩亦在宮廷之中，所以陸若漢神父就主教以（印度總督）使節的使命訪問宮廷一事與他商量，因為他是負責與葡萄牙人交涉的人，要求他也出席，與太閤交涉。”“主教與寺澤一起到達伏見的宮廷，11月16日前往內殿，遞交了（印度總督）給太閤的禮物與親筆書信。太閤當着天下諸奉行和其他許多領主的面，以不同尋常的好意迎接了他，向他提出種種問題。他對所有的問題作了令人滿意的回答，而

太閤亦因為他來自遠方，請他在本城休息，參觀當地的眾多名勝。太閤雖然在1587年開始對教會全體加以迫害，迫害基督徒並驅逐耶穌會的神父，但由於1591年范禮安神父的來訪而態度趨於緩和，對神父們毫無過錯的行為表示滿意。他還對陸若漢神父說，在驅逐神父們的時候，討厭的不是神父，也不是他們的教義，而是因為貪得無厭的基督教領主們。所以太閤允許教會的神父們在長崎、京都和大阪擁有住院與教堂。他還在眾人面前給予這樣的許可，祇要主教願意，就可以留在日本。主教對此非常高興，向主表示感謝，因為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在接受使節之命時，就想與日本的羊群聚在一起。”<sup>(16)</sup>

我們雖然不清楚陸若漢與豐臣秀吉打交道時的應答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這一外交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這位獨裁者的私人關係，根據1598年10月3日巴範濟神父於長崎寫給耶穌總會長的《1598年度日本年報》中稱，在此後日本當局一再重申的禁令中，陸若漢是唯一獲准滯留日本的耶穌會士。<sup>(17)</sup>或許是為了證明他與這位喜怒無常的獨裁者的個人情誼，巴範濟還告訴我們，就在豐臣秀吉病入膏肓的彌留之際，陸若漢曾單獨進入其臥室與之依依話別。由於前者在訣別時顯示出的別樣溫情，陸若漢幾乎忘了自己的身份，在如此傷感的氛圍中，“心情複雜”，幾乎不能自持。<sup>(18)</sup>

關於陸若漢與豐臣秀吉的私人關係與情感因素或可作進一步的心理分析，但可以肯定，即使是教會中最為保守的頑固分子，也從未對他們的關係和友誼說三道四。因為它不僅能帶來顯而易見的實際利益，而且符合自上而下的傳統傳教方式。

### 將軍私人貿易代理和教會“管區代表”

或因事涉機密，或由於教會文獻的刻意隱瞞，我們很少從中看到有關教會商業活動的類似記錄，但事實上教會贏利性的商業活動不僅規模龐大，而且與信仰傳播關係密切。從沙勿略時代開始<sup>(19)</sup>，它不僅一再成為打開傳教局面的外交利器，而且始終是教會賴以生存的主要經費來源。

在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遠東教區的巡視時期，商業活動的性質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與澳門當局簽訂的有關生絲貿易的協定<sup>(20)</sup>，使教會的商業活動成為冠冕堂皇具有計劃經濟性質的公開行為。為了與這種日趨正規化的商業活動相適應，范禮安不僅任命了專門負責此類事務的“管區代表 Procurador”<sup>(21)</sup>，而且還為分別派駐於長崎、澳門以及歐洲等地的他們制定了一整套的行為準則即所謂的《管區代表規則》。<sup>(22)</sup>

關於陸若漢出任管區代表的確切時間與期限，目前還有一些模糊之處。有學者認為，他在日本與中國兩度擔當此職前後約十二年之久，其中在長崎任日本管區代表的時間應在1598-1610年間。<sup>(23)</sup>與其他管區代表不同的是，陸若漢一直兼任“通辭”，還擔任德川家康的私人貿易代理。

關於陸若漢出任這一教外世俗職務的起因，教會《1601、1602年日本諸事》報告云：“葡萄牙定期船來到時，內府為向葡萄牙人購買他想要的物品，將一位家臣派遣到長崎，並命令他在與葡萄牙人交涉時，獲得天下之主的通譯、我們耶穌會的羅德里格斯（陸若漢）的幫助。但是，善良的家臣在購入了若干毫無價值的物品後，無視神父，一個人進行了交易。其後返回到了內府那裡，上交了收支報表和購入的物品。但是，內府對衣服の種類及其購買額不滿意，在瞭解到份量嚴重不足，品質極為低劣，且價格遠高於其他商人購買的東西後，非常憤怒。但家臣辯解為這一切都是他人的緣故，他誇大了問題，批評了神父與葡萄牙人，說他們無視天下之主，祇考慮自己的利益，並且相互勾結。這些中傷使內府極為惱火，而志摩再次煽風點火，說：葡萄牙人無視自己的命令，不允許他們來到日本。無論如何，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清楚的。如果確定傳教士也有責任，就應該懲罰傳教士與葡萄牙人。調查真相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內府再次將羅德里格斯喚去，對他說：我很高興瞭解了傳教士的品質與誠實。我相信今後他們在所有事情上也是極為清廉純潔的人。志摩再也不要管理或干涉定期航船和傳教士的事了。就這樣，（內府）本人獨佔

了（與葡人的交易），他為此發佈的特許狀，宣佈葡人和神父們是直接的交易者，政廳內的所有人都因此瞭解了事件的真相。他的奉行和官員們對陸若漢奉內府之命當面說明事件真相時所表現的謙恭態度極為感動，並趁機要求對我們的諸事作有利的處理。因為陸若漢極力庇護神父和葡萄牙人，而沒有將責任推卸給任何人，也沒有用自己的語言損害他人。他就像一位聖職人員，在這裡的所有人看到一切都因此深受感動，對他產生了親切感。”<sup>(24)</sup>

根據以上描述，我們不難發現，德川家康對陸若漢的信任並不僅僅是因為“傳教士的品質與誠實”，正如報告撰寫者所言，這一破格任命的目的在於“內府本人獨佔了與葡萄牙人的交易”。而另一方面，善於把握機會的傳教士亦未放過良機，他們“趁機要求（德川家康）對我們的諸事作有利的處理”，並讓陸若漢充份利用這一特殊職務之便，“極力庇護神父和葡萄牙人”。

從陸若漢個人的角度看，身兼數職的特殊身份迫使他面對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並導致其工作具有某種政治色彩。事實上，陸若漢每年不僅要在長崎處理一個管區代表的份內之事，還必須前往京都，協調教會與幕府的商業與政治關係。

史料記載，在范禮安離去幾天後，陸若漢與村山等安一起前往京都，同行中包括駐長崎的葡人、前一年進入長崎港口的葡人船員代表。此行問題之一是由於絲價過高，前往購買的日本商人沒有獲得希望得到的生絲。此事通過兩位管員傳到家康耳中，而在2月份的兩次會面中，家康的憤怒消除了。

1604年，陸若漢再次前往京都。值得令人回味的是，由於1603年7月澳門定期航船遭到荷蘭人的搶劫、日本教會因此喪失經濟來源並陷入財政危機時<sup>(25)</sup>，在困難時刻伸出援手的救星，竟然是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當他從1604年訪問京都的陸若漢那裡聽說這一消息後，不僅贈給教會350兩，並且還主動地借給他們5,000兩，並且申明，教會可以在他們認為方便的時候歸還這筆借款。<sup>(26)</sup>

1606年9月，陸若漢再次前往京都。作為兼任教會“通辭”、家康私人貿易代理人以及管區代表三

重職務的陸若漢，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協調幕府與葡萄牙商人以及教會之間的經濟關係。1606年8月14日，葡萄牙商船迪亞哥號在經過漫長的航行後進入長崎港，但在生絲交易時卻發生糾紛，葡萄牙商人威脅說要將貨運回澳門，在這個時候，經陸若漢的調解，雙方最終達成交易，而陸若漢在其中的作用亦為德川家康所認識。<sup>(27)</sup>

在1606年的京都之行中，陸若漢為將軍帶去尼古拉修士製作的鐘錶，並經過遊說最終使將軍打破慣例，同意讓主教塞爾凱拉（Dom Luís Cerqueira）於1606年10月，以主教身份正式拜訪德川家康。在不久之後的1607年5月，耶穌會日本管區的管區長巴範濟（Francesco Pasio）神父亦在陸若漢的陪同下，前往駿河，訪問了德川家康，稍後又前往江戶，禮拜了新任將軍德川家光。<sup>(28)</sup>

應當承認，作為“通辭”和“管區代表”，陸若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另一方面，其身份與工作的特殊性，又不可避免使他受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垢病與攻擊。其中曾得到他幫助的塞爾凱拉主教就在1607年3月1日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指責道：

基於我對耶穌會抱有的愛情以及神賦予我堅守耶穌會憲章、保護其名聲與氣質的熱情，我不得不對這一世俗職務指出以下幾點，即耶穌會通過被稱為通辭的羅德里格斯神父，參與有關定期船事務和貿易、並對長崎有關事務進行的統治等世俗事務——雖然這僅僅是指導性的。這麼說是因為它已經成為世俗日本人、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議論紛紛的話題。我認為這些工作與我們的誓言並不相符，這才是導致非議的真正原因。上述羅德里格斯神父的過度介入，顯然缺乏作為修道士應有的謹慎與深思熟慮。我並不否認他對此事應對自如，且極為熟練。我斷言近年來我們在日本所蒙受的並持續至今的遭遇與不快，幾乎都緣於這些類似於行政事務的行為，雖然這並不能稱之為行政事務。（……）羅德里格斯在各種事務上一再欠缺慎重與小心，缺乏與修道士相配的品性，對此我毫不懷疑必須給他嚴厲的忠告。他

不光使與他交涉的人感到不快，而且還受到責難，被認為是（傳教的）弊端。<sup>(29)</sup>

更有甚者，教會內部還一度傳出有關陸若漢緋聞的流言蜚語。關於等安態度的轉變有各種不同說法，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流言是，1615年12月6日曼努埃爾·迪亞斯（Manuel Dias）在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指責陸若漢與長崎地方官員（等安）的妻子關係曖昧，並因此被驅往澳門。他聲稱：“還有關於四誓願神父若阿·羅德里格斯的事情。據謠傳，他在長崎時常常獨自一人，不帶隨從，與（地位）僅次於奉行的等安的妻子會面。其態度看上去極為狎褻，有時小便還將她帶入廁所，常常從衣服的敞口處伸手去摸她的乳房。看到此事的侍女將此事告訴等安，所以等安對妻子很冷淡，納了好幾個妾。等安與羅德里格斯神父斷交，最後將神父逐出日本，但驅逐他們時用了另外的理由。神父頭上有幾個大癰子，還有人說是性病。不知經過了怎樣的治療，頭上開了個大洞，經過一年多治療才癒合，但腦後難看的洞還是沒有合上。”<sup>(30)</sup>

關於這一駭人聽聞的桃色事件，我們很難確定它的真實與否<sup>(31)</sup>，但我們亦不難從中看出，陸若漢不同尋常的眾多職務，使得他面臨來自內外各個方面的重重壓力，而面對這一系列的誹謗、忌妒和道貌岸然的道德指控，內外交困的陸若漢終於1610年的塔克拉薩號事件之後<sup>(32)</sup>，被解除了管區代表和通辭的職務，於1611年3月乘船前往澳門，從此離開了生活了三十二年的日本。

關於陸若漢的悲劇性結局及其原因，在巴範濟之後擔任耶穌會遠東地區巡視員一職的維埃拉神父（Francisco Vieira）頗為明白。他說：

他（陸若漢）是有才能的，有着自發但可行的周詳考慮。對太閤和今天的皇帝以及日本的大小諸侯有不小的影響力，由於他的不斷努力，神父們才能在日本留到今天。由於他是管區的司庫，所以過深地捲入了貿易及長崎的市政管理，犯了錯誤，在外部亦有等安、左兵衛為首的許多敵人，因此受到迫害，並最終被流放。<sup>(33)</sup>

從陸若漢個人的經歷看，他在日本出任教會“通辭”並同時兼任管區代表及德川家康私人代理，無疑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許多人因而對他的最後結局頗感遺憾，認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如果以歷史學家的冷靜目光審視這一切，就不難發現，陸若漢大起大落的人生曲線與教會在日本的政治命運大致脛合，可以認為，陸若漢的飛黃騰達可謂時勢造英雄的典型，而他最後的黯然離去，而是時代發展所然，並非個人能力所能左右。

關於陸若漢的生平，還有許多方面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例如他在1605年和1620年分別撰寫的《日本大文典》和《日本小文典》，應該代表了耶穌會士研究日本語言的最高水平；此外，他在澳門期間的外交活動，尤其是他先後兩度率葡萄牙僱傭軍北上，為助明朝政府抵抗清軍；在山東巧遇朝鮮使節並向他們贈送書籍等事，都值得做深入的個案分析。<sup>(34)</sup>至於他直到去世之前仍在修訂的《日本教會史》一書，更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由於篇幅所限，這裡不一一介紹。

#### 【註】

- (1) 在16世紀的日本教會中，同名同姓的若阿·羅德里格斯至少有兩人，其中一人曾擔任管區長的秘書，並撰寫了數份年報報告，通常自我署名為João Rodrigues Girão。為與之相區別，日本人習慣地稱之為“通事件天連（神父）”，教會內部亦呼之曰 João Rodrigues Tçuzu。而陸若漢本人亦常常自署為 Joam Roiz [Rodriguez]。土井忠生：《〈日本教會史〉解說》（《日本教會史》，上）岩波書店，大航海時代叢書，IX，1978），頁30-31。
- (2) 1620年作於澳門的《日本管區所屬耶穌會士名錄》記述道：“若阿·羅德里格斯出於拉梅古主教區的塞魯拉塞里村的葡萄牙人。年齡59歲。入會四十二年。體格強健。修過哲學課程，學習神學四年。在四年中教授拉丁文。擔任該管區的會計十二年。1601年立四誓願。對日本語極為精通，且能進行靈巧的說教。”同上揭書頁30。
- (3) 參見庫珀（Michael Cooper）：《通辭羅德里格斯》（コボ《通辭ロドリ―ゲス》），松本玉譯，原書房，1991，頁13。
- (4) 根據1581年12月20日的會員名冊，當時神學院中的耶穌會員如下：院長菲蓋雷多（Melchior de Figueiredo）神父、葡萄牙人；安東尼奧（Antonio Prenestino）神父、教師，意大利人；阿瓦羅·迪亞斯（Álvaro Dias）神父，葡萄牙

- 人；曼努埃爾·波拉里（Manuel Borralho）修道士，副監事，葡萄牙人；養方軒·保祿修道士，日本人，說教老師；米蓋爾修道士，日本人，說教老師。另有學生五人，都是剛入會不久的葡萄牙修士。他們是蘇阿雷斯修士（Miguel Soares），科埃里修士（Pedro Coelho），戈伊斯修士（Amador de Góis），阿布雷烏修士（Luís de Abreu）和本文的主人公陸若漢。參見切希里克（Hubert Cieslik）：《府內的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第27輯（キシリク《府内のコレジオ》《キリシタン研究27》），吉川弘文館，1987，頁106-134。
- (5) 開設哲學課程的是著名的戈麥斯神父（Pedro Gomez），他在1583年11月2日的一封信中說：“我是在1583年9月20日到達府內的。到達那裡之後，我立即與諸住院的上長弗洛伊斯神父趕往下，訪問了領主（大友義統）和王（大友宗麟），接受了他們的盛大歡迎，此後，我立即按照視察員神父以及准管區長神父給我的指示，在府內開始了哲學課程。”參見註（4）所引書頁102。
- (6) 參見註（4）所引書頁37、38。
- (7) 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神父在1589年刊行於澳門的《日本遣歐使節對話錄》曾對當時歐洲教會學校的教育模式有如下介紹：“諸學科可以分為兩大類別，其中包括有有關語言的學問，以及研究事物的另一類學問。第一類學問包含文法學、修辭學、辯論術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各種學科。第二類內容眾多，涉獵極廣，其中包含着數量極多的學科。簡而言之，又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自然的學問，第二部分是關於倫理的學問，第三部分研究超自然的事物。在關於自然的部分如，僅憑理性之光考察並思考萬物理法，它可以理解為研究自然的學問，所有學問均歸屬於此。這一系列中首先是被泛稱為數學的四學科，即幾何、算術、音樂和天文學，其中第一學科是研究大小，第二學科是研究數量，第三學科是研究聲音，第四學科是認識天空。”孟三德：《天正遣歐使節記》（デサンデ：《天正遣歐使節記》），泉井久之助等譯，雄松堂出版，新異國叢書，5，1984，頁251-252。
- (8) 轉引自參見註（4）所引書頁79-80。
- (9) 村上直次郎譯注：《耶穌會日本年報》（イエズス会日本年報），上），《新異國叢書》ⅢⅣ，雄松堂出版，1984，頁63-64。
- (10) 卡布拉爾在1581年9月15日寫給總會長的信中由衷稱贊道：“（神學院）除了拉丁語授課外，每天還有日本語授課，教他們的日本修士保羅精通日本語及其文章寫作，他還通過書籍翻譯為教會做出巨大貢獻。保祿已經年過七十，雖已年邁，但卻以謙遜和高德向我們提供了典範。願主使他長壽，再讓他多活幾年。”松田毅一主編：《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日本報告集》，第三期第五卷，同朋舍，1994，頁299-230。
- (11) 參見弗洛伊斯1592年10月1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1591、1592年度日本年報》，松田毅一主編：《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日本報告集》（《十六、十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一期第一卷，同朋舍，1987，頁227、230。
- (12) (13) 全註（11）上揭書頁232；頁261-264。
- (14) 弗洛伊斯的《1591、1592年度日本年報》記述道：“當關白殿（豐臣秀吉）來到下時，巡視員（范禮安）派遣羅德里格斯修士（陸若漢）和葡萄牙船長，去向他致意。因為出征朝鮮的基督徒代理人從京都送來這樣的通函。葡萄牙船長在許多盛裝葡萄牙人的伴隨下，分乘許多隻船，很高興地與陸若漢一起前往拜見關白殿。（關白殿）向陸若漢修道士問道：巡視員現在何處？他對送給印度總督的禮物還滿意嗎？”隨後他又說：我知道他還滯留於此。修士陸若漢還是留在我這裡好。（……）關白殿與他們暢談了兩個多小時，以表示對他們的恩賜，然後才讓他們退出。船長退出之後，陸若漢修道士在當地停留了一個多月，一再與關白殿下會談，始終受到極好的待遇。最後，陸若漢修道士因病返回長崎。關白殿知道此事後，問道：為甚麼他不在當地治療？當時，施藥院答道：那個修道士是外國人，所以必須進行不同於當地的其他食物療法。全註（11）上揭書頁283-284。
- (15) 關於陸若漢離開日本前往澳門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土井忠生認為他在1594年就去了澳門，並且一直滯留到1596年才重返長崎。參見土井忠生：《吉利志丹論考》（《吉利志丹論考》）。三省堂，1982，頁64。但庫珀明確指出，1595年，陸若漢曾偕到達日本的葡萄牙船長米蘭達前往京都，與豐臣秀吉進行了多次會談，雖然未能說服他取消1587年頒佈的傳教士驅逐令，卻獲得了他對傳教士繼續滯留日本的默許（《通辭羅德里格斯》（コボ《通辭ロドリーゲス》），松本玉譯，原書房，1991，頁80），本文取後一說。《日本教會史》下（ジョアン・ロドリーゲス《日本教會史》，下），岩波書店，大航海時代叢書第一期，X，1978，頁622。
- (16) 《主教傳》，全註（15）上揭書頁624-625，頁628-629。
- (17) 松田毅一上揭書，第一期第三卷，同朋舍，1988，頁105。
- (18) 1598年10月3日巴範濟神父於長崎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1598年度日本年報》中說：“陸若漢和其他數名葡萄牙人，以最近進入長崎的（葡萄牙船）的司令官的名義，為向國王進獻禮物而訪問了伏見。這是葡萄牙船隻到達日本港口後的習慣。太閤（豐臣秀吉）聽說他們的來訪後，命令奉行，（……）他祇允許陸若漢的謁見，不希望見其他人。神父為見國王經過非常多的庭園、廣場和房間，返回時沒有向導很難找到出口。陸若漢到達宮廷內的寢室時，太閤躺在純絲的蒲團中，頭枕在上面。他全身已經瘦得皮包骨頭，太閤命令陸若漢靠近些，說：‘看到你，我感覺好多了。我活不了幾天了，不知還能否見到你？’此外，太閤還對他本次及以前的數次來訪的辛苦表示感謝，隨後又賜給陸若漢200表米和一襲日本服裝，以及適合返回的乘船。（……）太閤還希望國王（秀賴）接受陸若漢的訪問。並希望他參加五奉行之子與其女兒的婚禮。太閤與陸若漢談了很久，表示了很大好意，然後才讓他退出。陸若漢心情複雜地辭去。松田毅一上揭書，第一期第三卷，頁108-109。
- (19) 沙勿略在抵達日本兩個多月後，便在1549年11月5日於日本鹿兒島致果阿的戈麥斯神父（António Gomes）的信中提到建立商館的合適地點，而附上了有利可圖的貨物清單以

及交易的注意事項。參見《沙勿略全書簡》(《ザウエル全書簡》)，河野純德譯注，平凡社，1985，頁510-512、717。

- (20) 1579年10月作於日本的 Sumario Indico 第17章披露說：“根據在中國(澳門)負責定期船事務的葡萄牙商人與我們訂立契約，日本耶穌會士每年從這一貿易獲得大約4000克魯扎多的收益。這一契約如下，澳門全體商人共同為向日本輸出生絲成立了公司。這一公司為了向日本耶穌會提供幫助，將40皮高(pico)——皮高大致相當於 quintal (公擔，100公斤)——作為耶穌會的份額帶到日本。他們會在日本出售這些生絲，如果不能全部出售，也將按照該公司出售其他所有生絲的價格進行計算，將(相當於)40皮高的出售價值給予耶穌會。從中大致可獲得2000特卡特的利潤。此外，由於載生絲通常不能全部出售，於是便在剩下的生絲中，再以適當價格將另外50皮高生絲讓給耶穌會。這部分生絲在定期商船離開後，由駐日本耶穌會的葡萄牙人管區代表經手出售。從中也可獲得約2000克魯扎多的收益。”參見高瀨弘一郎：《關於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基督教研究》，第十三輯(《日本イエズス会の生糸貿易について》)，《キリシタン研究13》，吉川弘文館，1980，頁148-149。
- (21)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的中譯本稱之為司庫，並在此後用括弧註其為會計。參見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以下簡稱《補編》)，耿昇譯，中華書局，1995，頁773-780。正如本文所論述的那樣，他們在商業事務上的使命遠比一般的司庫或會計工作更為廣泛而複雜。因此，本文依據國外學者的習慣稱呼，將“Procurador”譯為管區代表。
- (22) 由於日本學者的努力工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些《規則》中的三份，即《日本的管區代表規則》、《駐中國(澳門)日本的管區代表規則》以及《駐葡萄牙的印度管區代表規則》。參見高瀨弘一郎：《耶穌會與日本》，1(《イエズス会と日本》，1)，大航海時代叢書第二期，岩波書店，1981，頁593-605、606-624、625-639。
- (23) 高瀨弘一郎考證說：“根據1617年製成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神父及修士名冊，羅德里格斯(即陸若漢)‘在十二年期間擔任該管區的管區代表’。再據1620年9月製成的日本管區神父及修士名冊，他同樣‘在十二年期間擔任該管區的管區代表’。通辭羅德里格斯於1610年由日本轉任澳門，後在澳門亦擔任該駐地的日本管區代表。但是，他不會在轉任澳門後立即出任管區代表，因此，上述名冊中擔任日本管區代表十二年之說，應包括出任駐長崎管區代表在內，也就是說，他在1598年開始到1610年轉任澳門期間任管區代表。”參見高瀨弘一郎：《基督教時代的研究》(《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岩波書店，1977，頁517-518。
- (24) 參見松田毅一上揭書，第一期第四卷，頁78-80。
- (25) 《1603、1604年日本諸事》明確記錄說：“(定期航船)在澳門港被荷蘭人海盜奪去了。應該送給神父們和其他人的

所有貨物和(經濟)救濟都和船一起被奪去了。為此，(神父們)的生活陷入極度的貧困。神父們因此想離開在當地諸國的修道院和會館，返回印度，或遣散當地神學校中培養的年輕人，放棄在教堂中工作的僕人。這一切對他們來說是極為悲痛的。為求得耶穌基督的幫助，我們就此事再三商量。祇要能不離開這些為靈魂善福而侍奉我主耶穌的修道院和會館，神父們甚至樂意吃草，以承受天主給予我們的苦難。”松田毅一上揭書，第一期第四卷，頁179-180。

- (26) 據《1603、1604年日本諸事》記載，德川家康的慷慨解囊曾令耶穌會士極為感動。“如果不是神打動日本君主公方(德川家康)的心，僅憑神父們自己是沒有任何救濟辦法的。公方是異教徒，但當他知道定期航船被人俘虜以及神父們陷入貧窮困境後，給了350兩的施捨，一兩相當於我們貨幣中的六個特斯塔。此外，雖然沒有神父們的請求，但他為了援助我們，還送來5000兩的借款，以便我們能夠支付。這就像是來自上天的神授，因為雖然(處境)還很困難，但這些施捨和更為充裕的基督徒自己奉獻的若干施捨，可以維持到明年定期航船駛抵為止。”松田毅一上揭書，第一期第四卷，頁180。
- (27)(28)(30)《通辭羅德里格斯》(コボ《通辞ロドリーゲス》)，松本玉譯，原書房，1991，頁192-193；頁192-193、193-195；頁241-242。
- (29) 高瀨弘一郎：《耶穌會與日本》，1(《イエズス会と日本》)，大航海時代叢書第二期，岩波書店，1981，頁351、353-354。
- (31) 事實上，曾一再對陸若漢世俗事務表示不滿的塞爾凱拉主教，就曾在1607年3月1日於長崎寫給總會長的信中否定了這一極具殺傷力的傳言。他說：“那個告密者為了解除該神父(陸若漢)的這一職務，就貞潔問題向他作了虛偽的證言。他是本市重要的統治者，曾是該神父的密友。該神父亦將自己工作的一切通報於他。”參見高瀨弘一郎：《基督教時代對外關係的研究》(《キリシタン時代對外關係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97，頁632。
- (32) 關於事件的起因與經過，教會文獻中有許多大同小異的描述，綜合起來，情況大致如下：1610年7月29日，來自澳門的葡萄牙定期船塔克拉薩號進入了長崎。由於船長安德烈·潘索(André Pessoa)三年前曾在澳門處死過一些鬧事的日本船員，因此，該船的擁有者有馬晴信對他極為仇恨。在他的鼓動下，家康下令逮捕潘索，沒收船上貨物。1611年1月3日至5日，有馬晴信率部攻擊葡萄牙商船，經過數天戰鬥，葡萄牙商船爆炸沉沒，三十多名葡萄牙水手和船上的貨物一起沉入大海。參見《通辭羅德里格斯》，(コボ《通辞ロドリーゲス》)松本玉譯，原書房，1991，頁247-253。
- (33) 轉引自註(32)上揭書，頁246。
- (34) 關於陸若漢在澳門的情況，可參見湯開建、劉小珊的《明末耶穌會著名翻譯陸若漢在華活動考述》(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2005年夏季刊，總第55期，頁25-48)。本文重點在於論述陸若漢在日本的活動情況。